

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

許 倬 雲

一、西周的邑與都

西周封邑，其經濟上的功能，大率只是配合封田的聚落，散氏盤的第一句即有散邑的名稱，接下去又說到「迺即散用田」，下文敘述疆界時，又提到接界的眉邑與邢邑，以及眉邢「邑田」。可見田統於邑，也許邑是有司治田之所，也許即是封君自己居住的封邑。鬲从盂牽涉的邑有十三個之多，也每提到「其田」附屬於「其邑」。昏鼎中更明說「必尙俾處厥邑田厥田」，足知田者屬於厥邑，則邑應相當於田者聚居的村落。邑也不會十分大，新出土的宜侯矢殷有三十五個邑，可考的耕作人口數字是鬲有一千又五十夫，及庶人六百(□□)又六夫，合計爲一千六百多人，分配在三十五個邑中，每邑不過五十人上下而已¹。論語公冶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邑，若以一室八口計算，也只有八十口，與上文所得估計相去不遠，是以金文巾尸罍及素命罍可以有多到「錫縣二百」，「錫縣二百九十九」的記載²。左傳襄公廿八年，崔氏之亂結束後，晏子與北郭佐各別的由齊君賞賜六十個邑。這些邑是額外的賞賜，他們原有的邑數大率多於此數。論語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之後，這位喪邑的伯氏只能飯疏食了，則三百邑之數即是伯氏全部或大部的封邑³。這種小型的聚落，是不能當作城市的。

大致封君自己住的地方，有城牆作爲防禦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徵宗法地位與權威的宗廟，則這種邑稱爲「都」。據左傳莊公廿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⁴。」「都」是行政中心，宗教中心與軍事中心的三一體，也可能有較多的人口。若以上文一個封君擁有二三百個封邑作估計的基數，一個「都」至少是管理封地上一二萬人口的行政中樞，合計封君的家族，僕役，衛隊，若干有司的工作人員，以及支持這些人口的生產人口，則這個「都」當也有成千的居民。

本文爲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四本之一章，審閱人沈剛伯先生。

春秋初期，魯閔公二年，狄人滅衛，首都逃出來的難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⁵ 由此推算，共與滕各別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一點，大約即相當於小封君的「都」了。戰國策，「古者……，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⁶ 戰國策所說的「古者」往往指西周或春秋初期，如以三百丈作爲城的每邊長度計算，這種城仍比曲沃古城（東西1,100公尺，南北600-1,000公尺）略小些。曲沃古城有內外之分，而且有漢代遺物夾雜，可知這個古城到漢時仍舊存在。若桓叔初封的沃國並無外郭，則其原址可能會比曲沃古城現見遺址更小。戰國策所舉成數，也就相去不遠了⁷。三千家人口以五口計，爲一萬五千人；以八口計爲二萬四千人。取其約數，三千家當在二萬人口上下。衛國爲康叔之後，不爲小國，其國都人口，當與戰國策所舉「古者」大城的數字相差不遠。衛文公復國於楚丘後廿五年間由革車卅五乘休養生息，又擁有了革車三百乘的兵力⁸。五千人可以維持卅乘，則三百乘至少也須五萬人口。衛新遷楚丘，旁邑未必甚多，首都當是惟一大城，但五萬人口中有多少在楚丘城？却不易估計了。

古史渺遠難徵，由上文推論，我們至多只能假定一個封國的首都有一二萬人口，其下的旁邑，若是小封君的宗邑或都邑則有一二千人人口。周人兩都宗周與成周可能是特級城邑，又當作別論。

二、西周與春秋都邑的分佈

古史學家頗有試圖研究古代城市的分佈者。李濟先生是近代首次作此嘗試的考古學家。他根據地方志書的史料，找出 585 個周代的城邑，另外還有 233 個不易確定年代的城邑。這些古代城邑在西周時分佈於現在的陝、晉、豫以及河北；到東周時才見於江漢淮濟（山東、湖北、江蘇）諸處⁹。另一方面，地理學家章生道氏根據陳槃先生補充的春秋大事表，作了古代城市的分佈圖，却只列了九十七個春秋時代的古城。誠如 Paul Wheatley 指出，大島利一由春秋經傳包括左傳及公羊兩傳，已可找到七十八次在春秋時代築城的記載，若春秋時代只有九十七個城市，則西周勢必只有十九個城市。更何況經傳所記未必是當時各國的全部築城記錄¹⁰。

Paul Wheatley 自己也做了一番嘗試。以史記所見古代城邑爲主，參以先秦文

獻及古本竹書紀年的資料，他假定了西周九十一個城市的位置。其中自然西周封建諸侯的國都佔大多數¹¹。Paul Wheatley 的西周城市分佈圖（附圖一），基本上與伊藤道治的地圖（附圖二）是一致的。誠如伊藤指出，西周封建諸國，主要分佈於七個地域：第一，王朝首都的渭水流域；第二，黃河汾水地區；第三，洛陽——開封——安陽的三角地帶，成周的近畿；第四，山東半島，由鄒滕梁山以至濟水流域；第五，魯南、蘇北、豫東及皖北一帶；第六，豫南、鄂北；第七，鄂南、湘贛以至浙江。在這七個地域，文獻上的古城分佈與考古學上的遺址分佈，呈現相當高度的一致性¹²。

伊藤也發現至少在上述第二、三、四、六諸地域，姬姓諸侯的封國沿着殷周的古代交通路線分佈。另一方面，西周諸國也分佈在殷以來黃河流域的主要農業地域，西周的東進，似頗以掌握農業生產地區為大目標¹³。

西周封國具有顯著的軍事功能。周以西隅小國征服了廣大的東方平原，成周的建設，構成了兩都輔車相依的形勢。上文第三地域因而有最密集的分佈點。上文第二、四、六諸區的分佈點，主要的作用是第三區的延展及其拱衛。第五、七兩區只是外圍的外圍，分佈點自然少了。由於西周城邑的軍事功能，其分佈於交通要道上，也是自然的現象。一則便於彼此呼應，二則扼制反側的聯絡。張光直氏特別指出，周代城邑大都位於近山平原，又接近水道，築城扼守，自可占盡形勢¹⁴。

Paul Wheatley 的春秋時代城邑分佈圖（附圖三）係主要根據左傳的材料。出現於附圖三的城市有 466 個分佈點，比西周的分佈圖多出 375 個點。反映春秋時代極為活潑的都市化擴展過程¹⁵。

春秋築城記錄，見於經傳者有七十八起，其中魯築城廿七次，楚廿次，晉十次，鄭四次，齊三次，宋二次，邾陳吳越各一次。大島利一認為築城活動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防禦。魯國廿七次築城記錄中第一期（722-554 B. C.）十九次，是爲了對齊國的抗爭，第二期（553-505 B. C.）無築城記錄，第三期（504-480 B. C.）築城記錄八次則是爲了防備晉國的侵略¹⁶。

按之史實，經傳所載的築城活動絕非當時這一舉動的全部。不僅魯以外的各國的築城不可能全見於春秋經傳，即使魯國本身的築城也大有缺漏。魯國三桓的城邑：季孫氏的費，叔孫氏的郕，以及孟孫氏的成號爲「三都」。但「城費」見於左傳襄公七

年的夏天，「城成郭」見於襄公十五年夏天¹⁷。當時費爲季氏都邑已久，費地也早已有專駐的邑宰。成的築城又是「城成郭」，亦即加築外郭，並非首次建立城邑。由此看來，三都之中，至少二都的城築或修葺，未入春秋經傳。以此類推，魯國的築城建邑，未必盡入記載。旁國的城邑建築，更不見得都入經傳了。僅以鄭國爲例，據木村正雄的統計，鄭國有都邑 102 處，而提及築城的只有四處：一次是城虎牢，一次是城岳、戈、錫¹⁸。鄭國如此，他國城邑建立多未入經傳者當可想見。

春秋二百餘年中，城邑的數字，依 Wheatley 的估計增加了 375 個。若由當時十幾個較大的諸侯分攤，每國可得二三十個城邑。春秋時每國卿大夫即有十餘家，每家世襲的貴族至少有一個城邑，則這些 375 個城邑，也很可能以貴族的都邑爲主了。顧棟高的列國都邑表列了 386 個都邑：計周（40），魯（40），齊（38），鄭（31），宋（21），衛（18），曹（9），邾（9），莒（13），紀（4），徐（1），晉（71），虞（2），虢（2），秦（7），陳（4），蔡（4），許（6），庸（3），麇（1），吳（7），越（1）¹⁹。

春秋宗法制下，宗族有不斷分裂衍生爲大宗小宗的現象。分出去另立大宗的宗族成員可以自設宗廟，建立城邑。這種新設的城邑，也適足反映人口增殖。新立的城邑，有取名與分封貴族的氏相同者，如周的劉毛甘尹及齊的鮑晏崔隰；也可與貴族氏名不同，如魯的費（季氏）郕（叔孫）成（孟氏），衛的蒲（寧氏）戚（孫氏），及鄭七穆之邑，大率都仍沿用原有的地名。新立采邑，自然極可能新興的都市；即使新封君仍襲用已存在的舊封，也仍可因爲新封君之到來而使這個地區發展成爲較大的聚落。另一方面，有了聚落，某一新貴族才被分封到該處建立都邑無論上述那三種可能性之任何一個，都直接的反映都邑數字的增加。

春秋初期鄭國共叔段先請求封於制，鄭莊公以巖邑爲辭；改封於京，祭仲警告其中潛在的危險：「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²⁰ 晉國桓戚封於曲沃，其子武公於魯桓公八年滅翼，莊公十年遂并晉國²¹。魯閔公元年，晉侯爲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蒍認爲這是「分之都城，而位似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²²；狐突引用辛伯的話「內寵主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深以爲憂²³。

看來春秋初期「大都耦國」已是相當引人注意的現象，整個春秋時代，處處是「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引起的競爭。左傳昭公十年，「王曰國有大城，何如？（申無宇）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²⁴ 春秋末季，三都終於使季氏代政，六卿終於分爲三晉。政柄倒置與大都耦國是一件事的兩個表現相。整個春秋時代，始終有大夫執國命的現象，也就普遍的有新都邑的衍生。Wheatley 認為在春秋方始成長的三百多個都邑，當有不少於新興的政治都市。

三、西周春秋交通路線

西周的交通路線，大抵以宗周與成周之間的一條大路爲主軸，然後由成周輻射四及東方平面上的諸侯。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當即是主要的交通幹道。由成周四出的交通網，既有殷代王畿的舊規模爲基礎，也可能遠及淮濟之間的廣大地區。董彥堂先生作征人方日譜，即顯示殷王足跡所至，深入黃淮平原的東半部，繞了一個大圈子²⁵。不過周初東夷南夷常常不服，成康時期的伯懋父曾經因爲「東夷大反」而率領殷八師東征，達于海濱。晚至中葉昭王時期，淮夷仍舊「敢伐內國」，魯伯必須率「成周師氏」遠戍鎮壓。而同期伯辟父伐南夷，却是以「成師即東」。顯然在成周的東方與南方還有一條交通的弧線²⁶。本文第一節提到的宜侯矢，係於1954在江蘇丹徒煙墩山出土，這位虎侯在周王（可能是康王）東巡「商圖」時，改封爲宜侯，受賜「王人」及鄭的「七伯」，率領一批鬲及庶人，在宜立國。虎侯如即爲殷代的虎方，其地域當在豫東淮河上游。則由淮上到長江下游，似也是東巡向南可以到達的一條路線²⁷。

另一方面，南國範圍包括漢陽諸姬。申伯「于邑于謝」乃是南國之中最有名的例子。詩經二南，僅次于大小雅。但是更往南去，昭王南征不復，交通未必會很頻繁。大約江漢一途也就止于豫鄂之間的漢上而已。

往北去重要的諸侯有北燕與晉。但到春秋時代燕國仍不過問中原事，交通未便可知。「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孤懸北道也未與中原有很多的交往。

總合言之，西周的交通情形，仍只是在二都間的軸線爲主。各地區間的頻繁交

通，仍有待於春秋時代方得開展。以王庭為中心的朝聘征伐，形同輻湊，而春秋諸侯間的戰爭會盟，成為多中心多方向的交通，情形就比較繁雜了。

春秋列國交通，由初期宋魯衛鄭為中心，逐步進入宋齊晉楚爭霸的局面，牽涉的諸侯越來越多。尤其是晉楚之從，不管是隨着霸主出征，抑是會盟，十餘諸侯齊赴會所是常見的事。輜重往返，聘幣運輸，無不足以促進交通的發展，最後必然會有幾條常走的大道出現。

中原用兵之地，四通八達。至於橫越中原的東西道路，黃河北岸太行南麓有一條齊晉之間的通道，經過衛國便在泰山之北，濟之南，直驅臨淄了。秦與東方的通道，當循黃河南岸的大道，秦晉之間却走渭北汾涇流域，秦輸晉粟，自雍及絳，所謂泛舟之役，是水路，穀之戰則是兵車渡河的旱路。東平原上，齊魯宋衛與王室之間午道交叉，當仍以宋鄭為主要的交通中心。

南北之間，晉國向北開疆闢土，齊國也為了燕而伐山戎，中原北出，當有東西兩途，一在太行山東，一在太行山西。更重要的南北通道，毋寧是中原南出直達江漢的兩條路。一線為申呂方城，經漢水而至鄭都，一線是經陳蔡到漢東的東線。上述西線的上端，又可沿丹江漢水的河谷延伸入關中。魯定公五年，吳師入鄭，申包胥秦庭一哭，秦師五百乘的兵力，經此東下，這一條路當也不能不有相當規模的交通量。

春秋末年新興的吳越兩國，北出須經徐淮泗上，魯哀公九年邳溝連絡江淮，一端是今日的揚州，另一端則在淮陰縣境。為了黃池會盟，又有新的運河（黃溝）連絡濟泗兩水，由外黃（河南杞縣東北）經定陶以迄今日江蘇的沛縣。由吳入中原，可以循邳溝黃溝，打通江淮濟泗，乘舟直達。這條人工運河另有支線北屬之沂，則又可北達曲阜，所謂商魯之間的一線。吳楚相爭，戰場似以淮水流域為主，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淮泗，大別，小別，柏舉，一連串的地名，無不在淮河一線。吳徐承帥舟師泝海入齊，越人沿海泝淮截夫差歸途，兩事說明沿海航行也是已知的交通線²⁸。

四、春秋時代的商業

頻繁的列國交通，倒也不限於兵車來往及官方的使用。有眼光的領袖也會看出交通方便對於貿易的用處。本文作者在「周代的衣食住行」一文中，已說到周代國道系

統有其理想的水準。路邊有行道樹，按時要修築橋樑，沿途有館舍，並且有驛傳的制度。今不贅述。春秋時代，在上節所述的主要交通線上，因為來往多了，官方為此修路，也是可想像的事。例如魯襄公卅一年，鄭國的子產責備盟主晉國忽略了接待賓客的責任，其中有一條該做的事即是「司空以時平易道路」。魯昭公元年，秦后子過晉，其車千乘也曾「造舟於河」，使秦晉之間有了浮梁²⁹。吳國爲了參加中原會盟及用兵，可以不憚煩的開掘邗溝及黃溝，陸地開路工程比開運河方便，想來爲了軍事及大批的運輸，交通線有較永久的道路，毋寧是合理的假定。

在這種交通線上，商販運輸，無妨與官方的用途同時有之。魯僖公卅五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顯然走的是一條大路，及滑，大軍却遇上了赴周貿易的鄭國商人弦高。倉猝之際，弦高以牛十二作爲犒師。若這些牛均由弦高的車隊中提供，則這一個商隊不能算小。同時他又「使遽告于鄭」遽是傳驛，更足見商人也可以使用大路上的傳驛設備³⁰。魯成公五年，晉國山崩，晉公以傳召伯宗。在路上遇見重載的運輸車。伯宗的驛車要求他讓道，這位駕車的「重人」則說「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大路上重載的車輛不易轉動讓路，官家的急傳以繞行爲速，足見民間車輛在大道上行駛也是常事³¹。甚至官方還開路以方便商業爲着眼點。晉文公新爲晉君，經濟政策中即有「輕關易道，通商寬農」一項。平易道路並非僅僅戎車是利時³²。

方便的交通，可以導致各地區物品的交流。地方性的特產尤可變成「外銷」的貨品。齊國濱海，魚鹽爲得天獨厚的資源。齊國始終富強，以魚鹽之利爲主要的經濟原因。是以管仲「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³³。魯國的紡織工業，在春秋的中國，大約是很特出的。魯成公二年，楚軍侵及陽橋，魯國送給楚一百名工匠，一百名裁縫，一百名織工，才換得和平。足見魯國的手工藝有其特長。另一段故事：昭公二十六年魯國季孫氏的家臣，賄賂齊國大臣高齋的是兩匹極薄的細錦，卷縛如瑱，只有小小一把，其工細可知³⁴。楚國在南方崛起，浸淫乎問鼎中原，齊晉霸局，都以楚爲主要敵手。但不論戰爭抑是和平，夏楚週旋的後果，誠如傅孟真先生指出的古代東西夷夏局面，一轉而爲南北對峙。這一局面却也使南方的特產爲北方所用。楚材晉用，固不僅限於人材，原也包括物產在內。所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³⁵。晉文公得國以前，流浪在外十九年。他在楚國與楚君談

話，說到未來將退避三舍以報楚國，也說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可見至少楚國的羽毛齒革早已可能外銷晉國了³⁶。事實上，春秋已有一些往還列國之間的國際商人。魯文公四年，晉國荀營被俘在楚，鄭國的賈人打算把他藏在褚中走私出境，事情未成，荀營被釋。後來這位賈人赴晉，又遇見了已成為重要人物的荀營，待他甚厚。他不願居功，遂赴齊國。數其足跡，這位歷史上未留姓字的鄭賈人，顯然在楚晉齊鄭諸處貿遷來往。褚絮爲物不算貴重，仍可成爲當時區間貿易的貨物，更貴重易運的貨品，大約尤爲商人當作貿易物品了³⁷。

當時各國以鄭衛宋居交通的衝要，是以發展了相當程度的商業。前面弦高，鄭賈人各條例證，都說明了鄭國商人的活躍於國際間。鄭國國內，商人與政府之間也有極密切的關係。左傳昭公十六年，記載一段政府與商人的協議：晉國使韓起在鄭國想要購買一隻玉環，價錢已講妥了，韓起向鄭國的子產請求購置，子產回答「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盟，故能相係心至今」³⁸。由這段故事推斷，鄭國的商人有某種相當於公會的組織，方可成爲盟誓的主體。當年鄭桓公東來，鄭國的商人可能原來非其服屬，委質爲臣，却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鄭對於市易一途，確有專門的官員管理，號爲褚師。公孫黑將死，還希望兒子能得到這個職務³⁹。

五、春秋的都邑

各國都邑，以左傳所見的描述，約述如下：

鄭國都城，由散見的地名綜合，其規模似乎頗爲可觀。城門有南門曰里門，通向成周玉畿，東門曰鄆門，東走魯衛。西門曰師之梁，北門無別名。外面一層，楚伐鄭入于桔秩之門，然後入自純門，則南門至少有三重。純門之內有達市，據說是郭內道上的市街。皇門之內仍有達路，據說寬有九軌。城南另有時門，臨洧水之上，不知是否水門？宋伐鄭楚渠門入及大達，則東門也有二重，而且也有很寬廣的大路。自西入城可經墓門之瀆入國，大約實在是水門了。北門有舊北門，相對而言，當有一個新北門？其內則又有闔門。東南門曰倉門，道路名稱，除上述達路，大達外，猶有周氏之

衢，子產殺公孫黑，尸諸於此「加木焉」，必是來往行人不少的地方，始宜於陳尸示衆，公告罪名。住宅區有南里，處於桔秩之門外面，是以知伯伐鄭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當是附郭的新擴區？論語有東里子產之稱，則東里也是城東的住宅區⁴⁰。這個城市有三層城門，城外却仍有南里，最可能是由于城市的膨脹，必須一次又一次的加築外城圈，使城外的人口也獲得適當的保護。達市之稱，尤饒興味，當是大道漸發展爲商業區。而鄭國大達之寬廣，自然對交通有其作用⁴¹。

衛也是春秋時代重要的都邑，衛原都朝歌，因狄難而遷楚邱，魯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又因偪於狄人之圍而遷都帝邱，地在濮水之上。自此以後，所謂衛只指此地。孔子過衛，大爲讚嘆衛人口之衆多⁴²。工商在衛，也有其舉足輕重的位置，衛侯以受辱而擬叛晉，王孫賈爲了激怒衛人，宣稱「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終于激起衛人同仇敵愾的氣慨。可見工商或佔庶民之多數，或爲國命之所寄⁴³。其地除東西南北四門外尚有闕門，似是稍爲偏側的城門。郭門有豚澤之門，近關及近郭的死鳥，大路則有馬路之衢⁴⁴。

宋都商丘，城門特多，正東曰揚門，東城南門曰澤門，其北門曰桐門，西門無別名，東南城門曰盧門，又有曹門，西北走曹，則當是西北門。蒙門，依蒙城方位定之，亦是東北門。外城門曰桑林門，關門曰郕門。里名有南里、新里、公里。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則南里有可據以爲叛的實力或建築物，當不是很小的地區。全城城門不僅在正方位上，也可在四個偏角。所謂東城南門，據孟子魯君夜間之宋呼于涇澤之門一事觀之，當是外城門。可能東城即是東郭的地區。這個城區大約也頗不小的。添設的外郭當也是爲了保護膨脹的人口⁴⁵。

魯都曲阜，地點不如鄭、衛、宋、居四衝之地，但因春秋記魯特詳，對曲阜的描述也特多細節。城長委曲七八里，其正南曰稷門，僖公廿年更高大而新之號爲高門，南門之西曰雩門，是南城西門。東門之左曰始明門，亦曰上東門是東城之北門，定公八年，公歛處父帥成人自此入城，與陽虎戰於南門之內。由此推論，東城也是一個子城型的外郭。東門之右鹿門，是東城南門。襄公二十三年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則外此便別無城門，可見東城是一個外城。正西的史門，正北的圭門，又名爭門，西郭門曰子駒之門，東北郭門曰萊門。宮中若干處高臺及廟寢。其內城曰中城。城外則有東

郛西郛與中城對言。大路有五父之衢。季武子對國人詛盟於此，可知是來往行人衆多之處。曲阜的大概情形，可以略知⁴⁶。

齊都臨淄，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門，是春秋有名的大城邑。由已知的城門言之，其西曰雍門，南曰稷門，西南曰申門，西北曰揚門，東門曰東閭，東南曰鹿門，郭門曰郭關。官城外門曰虎門，城內大路曰莊曰獄。孟子所謂置之莊獄之間，以象徵滿是齊國口音的地方，當是人來人往的大街。魯襄公二十八年，陳桓子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道路而可停駐百乘木材，其寬廣可知⁴⁷。

晉自穆侯以後居絳，考侯改絳曰翼，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命之曰絳，則翼與絳原是一地二名，但新闢的北城子城，襲用了舊名而已。晉于魯成公六年遷都新田，又名新都曰絳，自此迄於春秋末，都以新田爲絳。其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當時另有可遷之地爲郇瑕氏之地，離產鹽的解池不遠，韓厥却以爲「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貪」，主張不要遷去土薄水淡的郇瑕，而遷都土厚水深的新田⁴⁸。足見韓厥原意只在發展都城附近的農業，而不主張讓人民有機會追求「末利」。絳既以農產爲主，又不居交通要道，然而絳到底是霸主的都城，冠蓋往來，仍難免某種程度的商業活動，是以叔向說「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楨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于民故也」⁴⁹。上文曾提過一位想私運晉俘離楚的「鄭之賈人」後來又曾在絳與當時已居顯職的荀偃晤面，這位賈人當即是能行諸侯之賄的富商一類人物。春秋末季，甚至晉國的稍次一級的城市，也可以成爲相當的財源。尹鐸被委任治晉陽時，他向趙簡子請示究竟視晉陽「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爲前者，城邑可發展爲經濟都會；爲後者，則可發展爲軍事基地⁵⁰。

南方諸國，文獻資料不足，但知吳城姑蘇係闔閭所建，大城城週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開陸門八水門八，均伍子胥所制，規模可想⁵¹。楚郢都爲南方巨強的首都，雖不知究竟，但想來也當是一個大型都會。

考古學上的資料，點點滴滴也積聚了不少。其中有些古城可能從未具有商市功能，然仍不失爲城邑。大部遺址經春秋至戰國繼續使用，而又以戰國遺址爲多。惟洛陽西部東周古城當是春秋王城故址。這個城址的城牆周圍約十二公里，比漢代古城大

得多。臨淄古城，東西約四公里，南北四公里餘。曲阜古城東西約 3.5 公里，南北約 2.5 公里。較小諸侯的城邑則有薛，前者東西 2.8 公里，南北 3.6 公里，後者的內城東西 900 公尺，南北 600 公尺，外城據估計東西 1.5 公里，南北約 1 公里⁵²。

春秋古城遺址，幾乎無例外的，有大量土台基地，散布在城區較為中心的部份，由其建築遺存判斷，當是宮室宗廟⁵³。核對文獻，春秋都邑中這種土台也不少。例如魯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台而請」，此台當是季氏最後還可據守的地點⁵⁴。曲阜又有泉台，觀台，党氏台，武子之台，諸處。後者是為了墮三都，魯公及其臣子據守抵抗叔孫輒的地方，可窺見高台有其軍略上的重要性，也適足顯示春秋都邑的政治性⁵⁵。

不過春秋城市中的貴族住宅，並非一定集中在內城或高亢的土台上。也許由於城市的成長迅速，也許由於市集的侵入住宅區，總之在貴族邸宅附近已有市場，例如晏氏在齊地位頗高，其住宅却隣近市區，左傳昭公三年，齊景公想為晏子換一處較好的住宅，理由是「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謝了，「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⁵⁶。游氏在鄭，也是大族，而其廟在大路的南面，其寢在大路的北面，庭院都很狹窄⁵⁷。廟寢通常相連，而被道路阻隔，自係不得已。大約城中已經擁擠，不得不爾。

由齊晉二例看來，有些春秋城邑已逐漸由純政治與軍事的功能轉變為兼具經濟功能了。

六、戰國時代的商業

春秋時代已發生的轉變，在戰國時代繼續而且加速。衆多小國的合併於七強及若干次等強國，使較大的地域統一於同一政府之下，對於改進道路及減少邦國間關隘限制，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戰國時代的行旅往返，可以說明此點。孟子以一個並無特殊職務的學者，可以後車數十乘，傳食於列國之間。而虞卿也可以挑着擔子單獨旅行。地居中原的大梁則可以有人民駕車來往日夜不休如三軍之衆⁵⁸。

區間貿易的另一個相關問題，是地方特產的互相依賴。禹貢如係戰國作品，則各州的土貢適足以表示戰國時各國的特產。如兗州的漆絲；青州的鹽絺海物、絲枲、栗

絲，徐州的蠙珠、魚、玄纁縞；揚州的金三品，瑤琨、篠、簞，齒、革、羽、毛，木材，織具，橘柚，荊州的羽、毛、齒、革，金三品，椀、榦、栝、柏，礪砥、矸丹，箇簞，菁茅，玄纁，璣組，豫州的漆、泉、絺、絲，織纈，梁州的璆鐵銀鏤，熊羆狐狸，織皮，雍州的球琳琅玕。此中有天然產物，有人工製品⁵⁹。周禮職方氏所舉各州特產，也與此相符：兗州與青州的魚產，揚州的錫銅竹箭，荊州的丹錫齒革，豫州的林漆絲枲，幽州的魚鹽，冀州的松柏，并州的布帛，雍州的玉石⁶⁰。大率言之，東方燕齊的魚鹽，南方荊楚的金屬木材，中原的絲麻紡織品，都是各地天然條件所賦與的特產，有全中國性的市場，却不是各地都能生產。

以工藝方面言之，各地也自有特色。例如考古常發現的戰國漆器，似以楚國為主要產地。其藝術之精美，已為人所共知，不用此處介紹⁶¹。又如宋人的精細雕刻，大約獨擅勝場，韓非子舉了宋人刻畫藝術的例子。據說「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著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⁶²。直到漢代仍有宋畫吳冶之稱⁶³。這許多地方特產是可以為各地的消費者一體享用的。李斯諫逐客書即指出秦王宮中種種服御使用的珍寶玩好盡出自四方各地，例如昆山之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太阿之劍，翠鳳之旗，靈囂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駿良馱馱，江南金錫，西蜀丹青，宛珠傅璣，阿綈之衣，錦繡之飾，……都不是秦國的土產而輻輳於秦庭⁶⁴。

最足以表現活潑的商業活動者，厥為貨幣的出現，春秋時代的貨賄似仍以實物為主，而戰國時代則已有大量的銅製貨幣週流各地。文獻中提到用貨幣之處，多不勝枚舉⁶⁵。

戰國貨幣的實物，傳世殊多。可分刀，布，圓錢，楚鏃四種，刀幣主要流行於齊燕趙，齊刀較大尖頭，燕趙的刀，十型，方頭或圓頭。布錢為三晉的貨幣，有方肩，圓肩，方足尖足，方袴，圓袴諸種。周秦用圓錢，楚用類似貝形的銅幣，而同時也有劃成小格金版，上書「郢」或「陳」，作為貨幣。凡此種種貨幣，多有鑄造地點，貨幣單位及價值，如刀布有「梁正尚全尚」，「垣鉏」，「齊古化」，「齊建邦造古化」，秦圓錢「重一兩十二朱」之類，不勝枚舉⁶⁶。

一國貨幣之出現於另一國，自可說明兩地之間有經濟交流。古代窖藏出土有包括

諸種貨幣於同一容器中的例證，更可說明貨幣之無國界，正爲了經濟上中國已是一個互相勾絡的整體。再以特殊情形言之，源於齊國的刀幣，能侵入燕國已可覩見齊國經濟力的影響於北鄰，而趙國兼用刀布，足知刀幣的力量已侵入布幣流通的三晉範圍了⁶⁷。

總之，上述貨幣經濟的發展，與活潑的區間貿易互爲倚伏，而兩者都相當程度的促進城市的發展。

七、戰國 的 城 市

據漢代的鹽鐵論通有篇追述戰國的大都市，「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兩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⁶⁸。以上各地都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爲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也兼具政治功能，如臨淄即爲齊國的首都。若加上後一類，則大都市中尙須包括曾爲國都的安邑，大梁；鄭，河南，洛陽，鄢郢，壽春；陳，濮陽；雍，咸陽各處。再加上定陶，鄧，宛，宜陽，吳會，大約戰國時代的中國有二三十個頭等的大都市。如以曾鑄貨幣的都市加進去，又可增加一批：例如魏的蒲阪，山陽，晉陽，共，虞，垂，垣，平周，皮氏，高都，宅陽，長垣；趙的柏人，藺，高石，晉陽，武安，中陽，武平，安平，中都；韓的平陽，高都，安留，長子，湟，盧氏；齊的即墨……。大約總數當在五六十個左右⁶⁹。

戰國的行政都市，因郡縣制的確立，而使郡城縣治均具有構成都市的條件，可能郡城有數萬人口，縣城有數千人口，是以三萬戶是封太守的標準，而千戶是封縣令的標準⁷⁰。也因此而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的說法⁷¹。上黨一郡，即有城市之邑十七，城邑相望，倒也未必是過分的誇張⁷²。若干居交通要道的城市，當然可以有更多的人口，宜陽不過是一個縣治，但因其居南陽與上黨之間，具有戰略地位，兩郡的積蓄都集中在宜陽，以至可以號稱「名爲縣，其實郡也」。宜陽的城週可有八里，軍隊可駐十萬，積粟可支數年，其大可想可知⁷³。

戰國都市有單純由於經濟條件而發達的，最好的例子是陶和衛。陶在今山東定陶附近，春秋爲曹地，無籍籍名，春秋末年，陶忽然成爲繁榮的都會，陶朱公在陶卜

居，即爲了「陶爲天下之中」，於此三致千金。近人史念海由歷史地理研究，認爲吳開掘了邗溝及黃溝，使江，淮、濟，泗幾條河流可以聯絡交通。陶居這一新水道網的樞紐，又加上濟泗之間西至黃河平原都是古代重要的農業生產地區，是以陶佔盡地利。鴻溝的開鑿，更使陶居於濟，汝，淮，泗水道網的中央，近則西迫韓魏，東連齊魯，遠則可由水道及於江淮。這一經濟都會的繁，竟可使強秦的權臣魏冉掠取陶作爲自己的封邑⁷⁴。

另一經濟都市爲衛的濮陽，衛在戰國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國，但濮陽可經濟水與陶聯絡，由秦經安邑向東通往定陶的北道，非經過濮陽不可，魏遷大梁，大梁邯鄲之間的交通也曾經過濮陽。河濟之間農產亦富，也使濮陽具備經濟都會的資格。由于水道縱橫，新興的經濟都市尚有獲水睢水之間的睢陽，獲水泗水之間的彭城，和楚夏之間的壽春⁷⁵。

此外，太行山東邊南北走向的大道連結了薊與邯鄲，「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的溫軹，「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的洛陽，「西通武關，東受江淮」的宛，關中「南鄰巴蜀，北接胡苑」，而櫟陽更是「北却戎翟，東通三晉」，咸陽又居關中的中心，鄭居江漢，上接巴蜀，下通吳會。凡此都是交通樞紐的地位⁷⁶。

考古學家發掘得到的戰國城市遺址，已爲數不少。張光直列舉了下列諸處及其概況（參看附圖4，但張氏所舉春秋時代遺址數例，則予排除）：

- (1)周王城，在河南洛陽，大致成正方形，北城城牆長 2,890 公尺，中央及靠南部的重要建築，城西北有陶窯及骨器作坊，城中散見水溝遺址。
- (2)魏安邑，在山西夏縣，城有外中內三層，中城居西北角，北牆長 4,500 公尺，南端寬 2,100 公尺，內城似是宮殿所在，正居大城圈的中央。
- (3)魏魏城，在山西芮城，未全部發掘。不是很整齊的正方形，每邊約長 1,500 公尺，有磚瓦遺存。
- (4)韓宜陽，在河南宜陽，發掘得夯土圍牆，正方，每邊長 1,400 公尺，有磚瓦散布遺址表面。
- (5)趙邯鄲，在河北邯鄲，遺址有相連接的二城，旁邊可能有第三個城址。本城約略成正方形，每邊長 1,400 公尺，東城有一子城，以本城東牆爲西牆，南北牆

各延伸約本城的一半長度，北城也有一段向北延展的牆垣，可能是另一子城。

本城南北中線上有一串土台基址，均有磚瓦散布，當是宮室宗廟的所在，城中
有若干墓葬。

(6)趙午城，在河北午城，略呈方形，每邊長 1,100 公尺，沿北牆有水溝，城中出
土磚瓦，布錢，銅鏃。

(7)趙午汲，在河北武安，有古城遺址二處，西城約呈長方形，東西 889 公尺，南
北 768 公尺，四城城門各有道路，城中有水井陶甕遺址。

(8)燕下都，在河北易縣自 1930 開始曾多次發掘，城中出土遺址及遺存均極豐富，
城呈長方形，東西長八公里，南北長四公里，中線另有一牆及水溝分割全城為
東西兩區，東城北區又有一牆隔開，約占東城三分之一的區域，西城較為後
築，東城北區有宮殿遺址的土台基址若干處。東城南區有冶鐵作坊，武器作
坊，鑄錢，燒陶，製骨器諸般工廠。宮殿及作坊四周為居住遺址，東城的西北
角則有墓葬羣。城中有水溝數條。

(9)齊臨淄，在山東臨淄，城東西長四公里，南北則較四公里稍長。西南角另隔為
小城，面積約 1,350 方公尺。出土遺物有磚瓦陶片，刀錢，錢模，銅鏃。陶製
鏡模，陶印。據估計，城中人口當有二萬戶。

(10)邾邾城，在山東鄒縣，城牆沿山而築，兩山夾輔，中間的谷地約 1,200 公尺寬，
即為城區。城中片土臺長 500 公尺，寬 250 公尺，當地居民稱之為皇臺，城中
有磚瓦陶片。

(11)滕，薛兩城，在山東滕縣，滕城約呈長方形東西約 800 公尺，南北約 600 公尺，
薛城呈不規則形，南牆東牆約略直線直交，西北為曲折的弧線，南牆約長二公
里，東牆略短。

(12)秦櫟陽，在陝西臨潼，城呈長方形，南北長 2,500 公尺，東西長 1,800 公尺，
有一條直街貫穿南北，兩條橫街，貫穿東西，城中出土磚瓦，井圈陶甕，下水
道，遺跡北牆外面有灌溉渠及濠溝遺跡。

(13)秦咸陽，在陝西咸陽，地居涇濱，城的輪廓，因未全部發掘，尙不可知。城中
有築在臺基上的房屋銅器，骨器及鐵釘。有不少瓦管，可能為古代下水道的遺

跡，水井，陶窖，窖穴，則所在都有。

(14)秦雍城，在陝西鳳翔，城長方形東西 4.5 公里，南北 2 公里，出土磚瓦，陶水管⁷⁷。

山西侯馬的牛村平望兩古城是春秋時代遺址，但也繼續到戰國以後。平望城作長方形南北最長部分約 1,700 公尺，東西最寬部分約 1,400 公尺，牆外有與城牆平行的濠溝，牆內有沿牆的車道。城中有宮殿遺跡的土臺基址。城南郊分佈許多鑄銅，燒陶在製骨器的作坊，當是手工業區。

此外還有一些較小的遺址，為韓魏趙燕楚的古城。大致均在近河地方，或作正方或呈長方，或隨地形建築，面積在 0.25 方公里至 1 平方公里之間，每邊有一二個城門及由此出入的道路，上述午汲古城的東西大街寬約 6 公尺，穿城而過，並有若干和大街垂直的小街道⁷⁸。

綜合言之，固然若干考古學上所見的戰國古城尚未發展為南市，大多數古城，則除了仍具有行政與軍事功能外，已有手工業作坊的普遍存在，城市方便整齊，橫街直衢，凡此均說明城市已有相當程度的工業生產與商貨貿易的功能。尤其前者，由其規模言，侯馬鑄銅工場的內範數以萬計，興隆冶鐵工場的農具鑄範重數百斤，凡此均可看出生產的數量相當龐大。而且侯馬鑄銅工場三處，多有專門的產品，也足見生產已有分化專業的趨向⁷⁹。

戰國時代商業的發達，由前敘貨幣流通的情形已可覘之。史記貨殖列傳更有極為生動的描述。太行山以西的材竹穀（穀樹的皮），繡（山間野紵），旄，玉石；山以東的魚鹽；江南的枌梓，薑桂，金，錫，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北邊的馬牛羊，旃裘筋角，都已商賈販運四方⁸⁰。可以致富的行業包括畜牧，養豬，養魚，植林，果園，養竹，造漆，藝麻，種桑，顏料植物與香料植物的栽培。城邑之中，經營酒漿，醢醫，屠宰，販糧，燃料，運輸，建材，木材，冶鑄，紡織，衣料，合漆，甚至鹹貨，乾貨……均可成千單位的製作與出售，以致巨富⁸¹。

其他先秦文獻資料，固然只有零碎片段的提到城市生活。綜合言之，仍可得到一些有趣的消息。史記所說諸般行業，很多可以點點滴滴得到證實。一個城市之中，有政府官署，宮室台榭。可是在附近即可有依賴手藝渡日的工匠作坊⁸²。街市朝聚暮

散，所謂「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這種貿易區大約是集中百業的市場⁸³。街市上面，大而珠寶銀樓，小而賣卜的小攤子，無不有之⁸⁴。市井之徒更是可在酒樓賭場中與朋輩飲食流連，酒色徵逐⁸⁵。城市中招徠了任俠姦人，也集中了高談闊論的學者名流⁸⁶。

由於人口衆多，手藝工匠也可以有不惡的工資，據說竟可以「一日作而五日食」⁸⁷。甚至殘廢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長，例如浣洗縫補，或篩精米，也足以餬口了⁸⁸。有許多人的人口在都市中謀生，因此不僅城郊會有種水菓蔬菜的「唐園」，有編打草鞋及草蓆的貧戶⁸⁹。而每天出入城門的車輻，也足够壓出兩條軌跡了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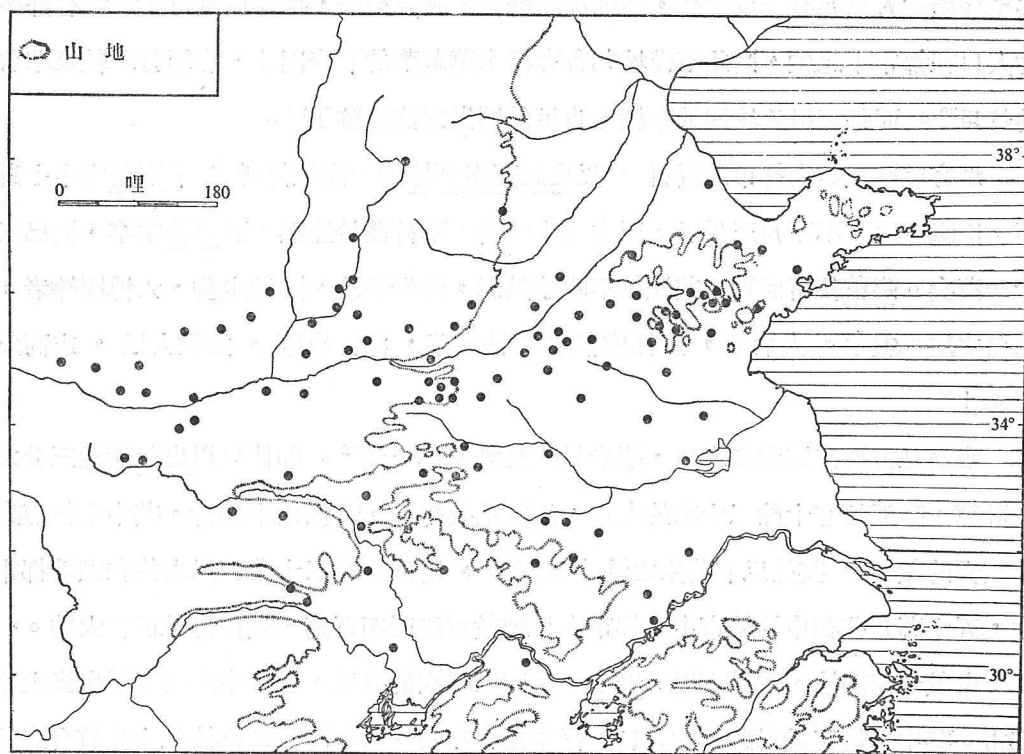
形容戰國頭等大都市的資料，以史記蘇秦列傳的一段最傳神：「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渾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⁶¹

臨淄是否真有這麼多人口，學者見仁見智並不一致⁹²。即使只以史記所說三分之一計算，臨淄仍有十餘二十萬的人口，全國重要都會，若以六十個計，其中十個有與此相當的數字，其餘以「萬家之邑」為標準，則全國有二十萬戶以上住在頭等都市中，五十萬戶住在中等城市中。都市人口總數可達三四百萬，數目仍是很龐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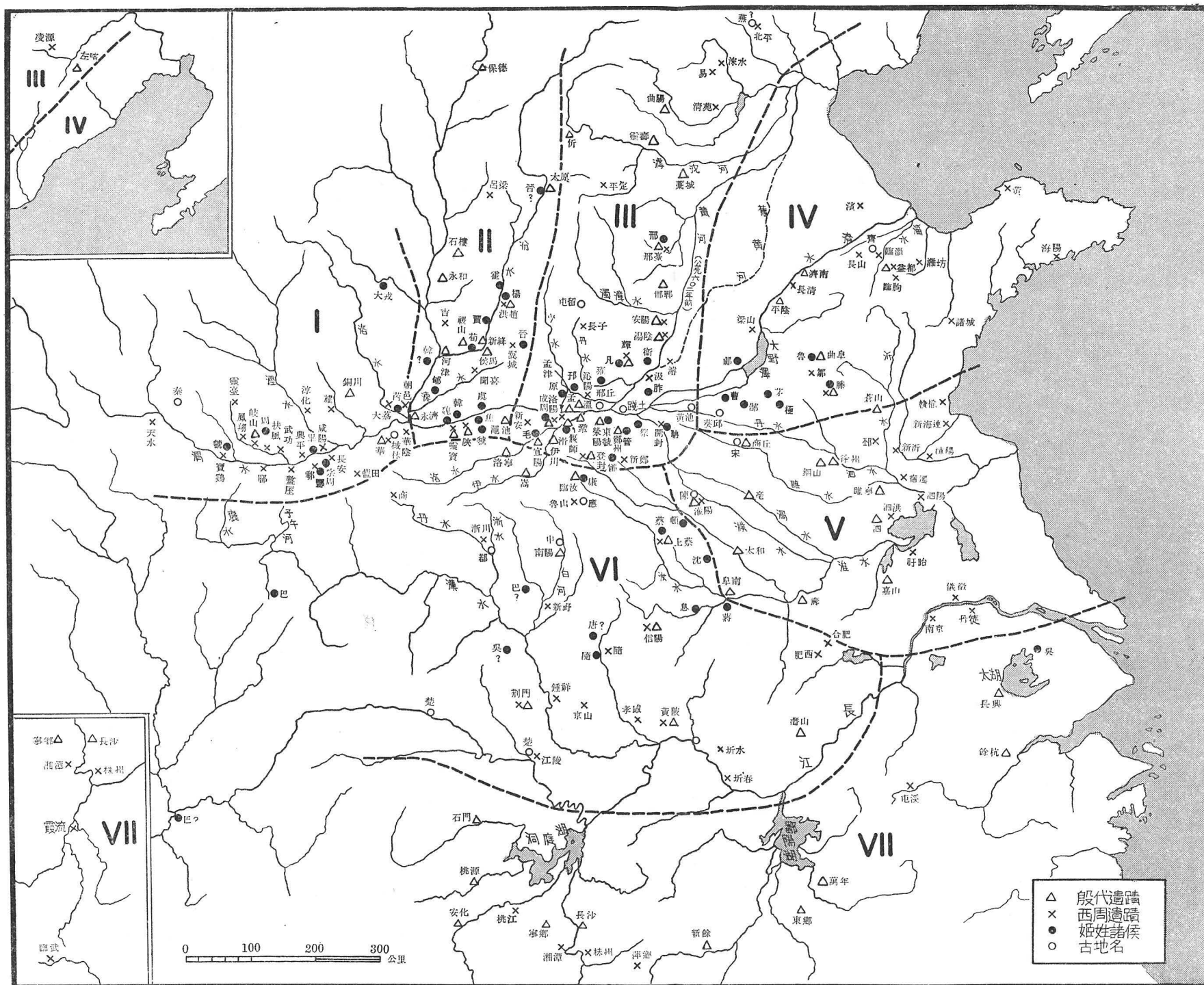
由數十家的邑，經過西周，春秋，戰國三時代的發展，古代中國具有了衆多大型都市。其中聚居了數以萬計的人口，從事諸種行業。戰國時代的都邑是十分符合多種功能的都市性格了。而街道的橫直正交，甚至還有下水系統，在在均足說明都市生活的水準已非常高。與戰國並世，在中東與地中海地區也都已有高度的都市文明，及繁忙的經濟活動。然而論規模，論總人口，論都市數字，中國古代的都市發展仍是罕有比倫的。

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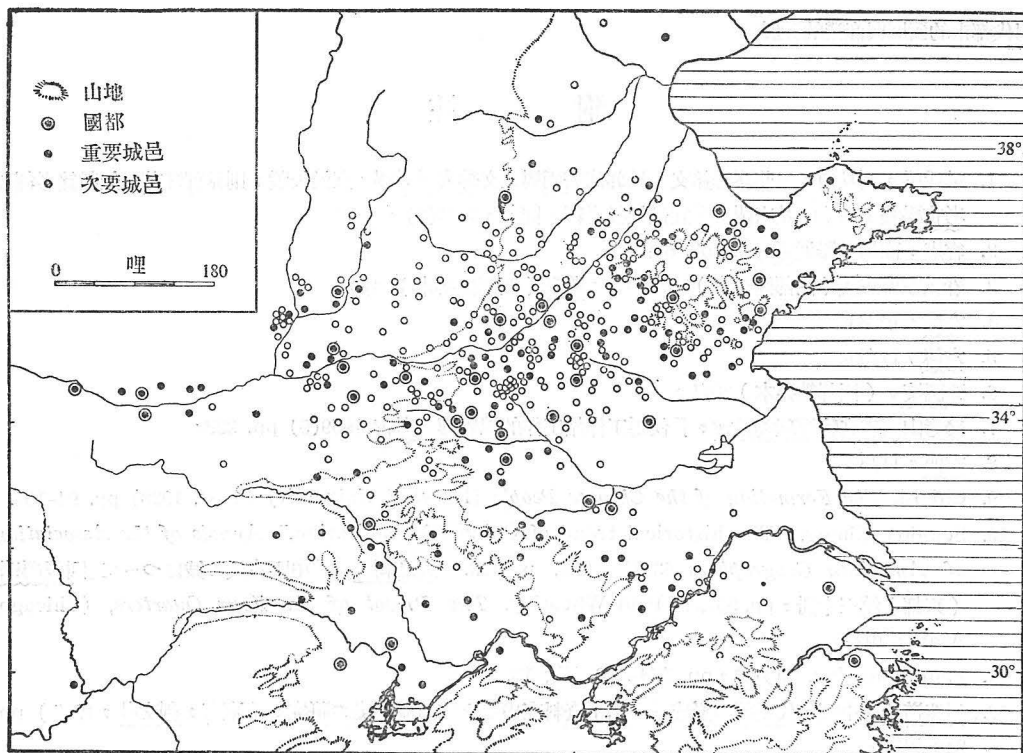
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與周代社會的變遷有密切的關係。周代都市的發展，主要分為兩類：一是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封建都市，二是以商業活動為中心的市場都市。封建都市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周代分封制的實施上，周天子將土地和人口分封給諸侯，諸侯再分封給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給士，形成了一種層層分封的封建制度。這種封建制度使得周代都市的發展呈現出分散性的特點，各級封建主在自己的封地內建立都市，作為統治和管理的中心。市場都市的發展，則主要體現在周代商業活動的繁榮上。周代商業活動的繁榮，主要體現在周代貨幣的出現和市場貿易的興盛上。周代貨幣的出現，使得市場貿易更加便利，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市場貿易的興盛，使得市場都市成為周代商業活動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促進了都市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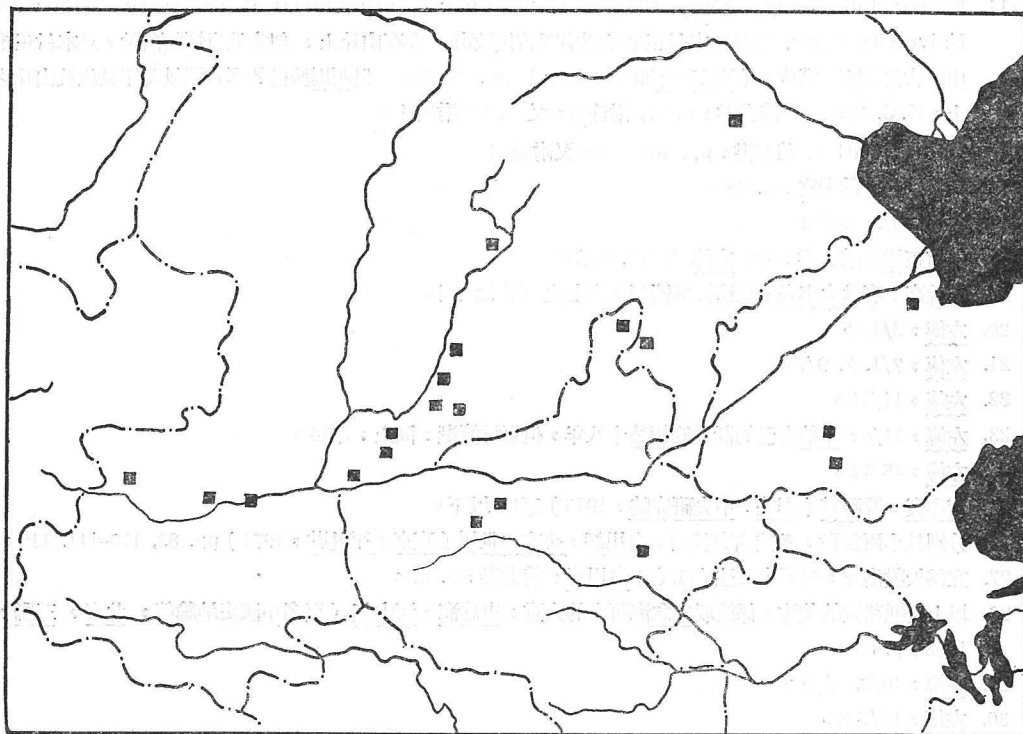
附圖一：西周城邑分佈圖
(採自 Paul Wheatly, 前引書 fig 13)



附圖二：西周封建諸侯圖
(採自伊能道治前引書 p. 248 後頁)



附圖三：春秋城邑分佈圖（採自 Paul Wheatly, 前引書 fig 14）



附圖四：東周古城遺址（採自據 Kwang chih Chang,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ig.96改製）

附 注

1. 散氏盤，讀从盤，魯鼎諸器銘文，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宜侯矢戣，則見郭沫若「矢戣銘考釋」考古學報 1956(1) 及唐蘭，「宜侯矢戣考釋」同上，1956(2)。
2.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 pp. 502, 509。
3. 春秋左傳正義（四部備要本）38/15-16。論語（四部備要本）14/3。
4. 左傳，10/8。
5. 左傳，11/5。
6. 戰國策，（四部備要本）20/1。
7. 參考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侯馬工作站工作的總收穫」考古 1959(5) pp. 222。
8. 左傳，11/8。
9. Chi L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 94-104.
10. Sen-dou Chang,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2) 1963, p. 113. 大島利一「中國古代的城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三十冊，pp. 53-54。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Chicago, Aldine 1971)
11. Paul Wheatley, 前引書，pp. 164-168, Fig 13.
12. 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の形成——出土資料を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5）pp. 248 以下。
13. 伊藤道治，前引書，pp. 276-278。
14. Kwang-chih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木村正雄認為中國古代城市，多在山丘上，似本於章炳麟舊說，見木村正雄中國古代帝國の構成，（東京，不昧堂，1965）pp. 74-76。但西周城邑的考古遺址却罕見位於山丘之上，K. C. Chang, 前引書，p. 67, 附注5，又 p. 66 附圖4。
15. Paul Wheatley, 前引書，pp. 168-173，又附圖14。
16. 大島利一，前引文，p. 55。
17. 左傳 30/5, 32/12。
18. 木村正雄，前引書，68，左傳 12/12, 59/3。
19.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皇清經解續編）表七之一至七之四。
20. 左傳，2/10。
21. 左傳，7/1, 2, 9/7。
22. 左傳，11/11。
23. 左傳，11/8，辛伯自己的話見於桓公十八年，但更為簡潔，同上，7/14。
24. 左傳，45/12。
25. 董作賓，殷曆譜（李莊，中央研究院，1945）9/48 以下。
26. 分別見小臣譚段，象豸與鏡，白川靜，金文の世界（東京，平凡社，1971）pp. 83, 110-111, 115。
27. 宜侯矢戣出處，參看本文注（1），（2）白川靜，前引書，p. 67。
28. 以上交通路線的敘述，係節取史念海研究的大意，史念海，河山集（又名中國史地論稿，北京，三聯，1962）p. 67-81。
29. 左傳，40/9, 41/9。
30. 左傳，17/7-8。
31. 左傳，26/5。

32. 國語，(四部備要本) 10/17。
33. 國語，6/14。
34. 左傳，25/12，52/1。
35. 左傳，37/7。
36. 左傳，15/6。
37. 左傳，26/3。
38. 左傳，47/11。
39. 左傳，42/3；其他各國有褚師一職爲宋、衛。也是世官，與此相似的則是魯國的賈正，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皇清經解續編本）10/31，37。
40. 顧棟高，前引文，表七之二/1-10。
41. 關於城郭問題，討論古代城市有雙重城牆及其作用者，有宮崎市定，「中國古代は封建制度か都市國家か」史林33卷2號（1950），惟城中人口固不必以農業爲或產者爲主體，如宣崎所說也。
42. 論語，13/3。
43. 左傳，55/8。
44. 顧棟高，前引文，七之二/20-23。
45. 顧棟高，前引文，七之二/12-15。
46. 顧棟高，前引文，10-20。
47. 顧棟高，前引文，22-25。
48. 左傳，26/7。近年考古發掘，在侯馬發現古城二處可能是新田的遺址，出土有宮殿廢址，銅器和骨器作坊，和陶窖。兩個古城都不算大，牛村古城南北的1,340~1,740公尺，東西長1,100~1,400公尺，西北角與平望古城接接，殆即翼與絳的關係？參看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侯馬工作站總收穫」考古 1959(5)，pp. 222-228。
49. 國語，14/14。
50. 國語，15/4。
51. 顧棟高，前引文，七之四/32。
52. 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澗濱東周城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59(2)。
大島利一，前引文，p. 60，參看關野雄 中國考古學研究（東京，1956），p. 281 及有關名城調查諸篇。
53. Kwang-Chih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pp. 67-68。
關野雄，「前漢魯國靈光殿の遺址」（前引中國考古學研究）。
54. 左傳，51/10。
55. 顧棟高，前引文，七之一/14-16，左傳，56/5。
59. 左傳，42/6-7。
57. 左傳，48/10。
58. 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16-118。
戰國外交使節動輒以百乘出使，戰國策隨處可見，如戰國策（四部備要本）22/6；孟子（四部備要本）6上/4；戰國策 22/3。
59. 尚書今古文注疏，（四部備要本）3上/7-3中/12。
60. 周禮正義，（四部備要本）63/3-64/4。
61. 高承祚，長沙出土楚漆器圖錄（上海，1955）序 p. 4，又可參看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槨墓」考古學報 1957(1) p. 99。
62. 韓非子，（四部備要本）7/4。
63. 淮南子，（四部備要本）19/7。

64. 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影印本）87/8-9。
65. 例如墨子經說下，「買刀糴相爲買，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墨子（四部備要本）10/12，此是討論物價與幣值的關係了。
66. 關於先秦貨幣的著作，王毓銓，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上海，1957）及同氏英文著作，Wang Yü-Chuan, *Early Chinese Coinage*, (New York,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1951)
67. Hsu 前引書，p. 121，王毓銓，前引書，p. 70。Cheng Te-kun, *Archaeology in China* (Cambridge, Heffer, 1963) Vol. III, p. 70。
夏鼐，新中國的考古收穫（北京，1961）p. 67。
68. 鹽鐵論，（四部備要本）1/6-7。
69. 楊寬，戰國史（上海，1955）pp. 47-48, 53-54。
70. 戰國策，18/9。
71. 戰國策，20/1。
72. 戰國策，18/9，又韓策謂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同上，27/1）病而日行一縣，縣邑之相邇可知。
73. 戰國策，1/2, 4/4。
74. 史念海，前引書，pp. 110-120。
75. 史念海，前引書，pp. 121-124。
76. 史念海，前引書，pp. 124-130。
77. Kwang-Chih Chang,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1968) pp. 280-305。
78. 夏鼐，前引書，p. 68。
79.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侯馬工作站工作的總收穫」考古，1959(5) pp. 222-228。
鄭紹宗，「熱河興隆渡現的戰國生產工具鑄範」考古通訊，1956(1)。
80. 史記，129/45。
81. 史記，129/31-37, 43-44。
82. 呂氏春秋記載宋國製轆的工人，住在貴族司城子罕的南隣。呂氏春秋（四部備要本）20/10。
83. 戰國策，11/3-4。
84. 關於珠寶店，如楚人賣珠，邠人買櫝還珠的故事，韓非子（四部備要本）11/3，關於銀樓有齊人往「鬻金者」之所奪金的故事，呂氏春秋 16/16，關於賣卜，戰國策 8/4。
85. 關於酒樓，韓非子 13/8，關於賭博及倡優，史記 129/29, 43。
86. 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據說有六萬家之多，史記 75/26，又如信陵君也以監門屠夫爲賓客，史記 77/4-5，齊宣王在稷下集合了文學游說之士數百千人，史記 46/31。
87. 管子，（四部備要本）15/14。
88. 莊子，（四部備要本）2/14。
89. 管子，23/15。
90. 孟子，14上/6。
91. 史記，69/27。
92. 如 Wheatley 即極爲懷疑此數的誇大，Paul Wheatley 前引書，p. 190，關野雄認爲以臨淄古城面積計算二三萬戶是相當合理的估計。中國考古學研究（東京，1956）pp. 141 以下。中國學者則至今未見有懷疑這個數字者。